

談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料 的發掘與研究的深化

吳文星*

* 吳文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本乎日本明治維新之經驗，引進近代西式教育制度，開啓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然而，此一制度之建立主要目的在於貫徹殖民政策，因此其與當時日本國內的教育體制截然有別，不論教育的形式或內容均具有特殊性，未必滿足臺灣人的教育需求及符合臺灣社會發展的最大利益，自不待言。惟此一兼具同化和近代化雙重取向的殖民教育，於五十年間所建立的規模和基礎，對戰後臺灣教育之發展具有不容忽視之影響，則是毋庸置疑。質言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乃是適切瞭解近代臺灣教育發展重要的一環。

戰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改隸中華民國，當局積極致力於「去日本化」、「立中國化」之政策；因此，對日治時期的歷史以強調臺灣人反抗異族統治作為主軸，藉以培養仇日、恨日之感情，並凝聚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以強化國族認同。同時，臺灣歷史為中國歷史中聊備一格之一部分，其在歷史教科書中所佔篇幅極為微小。稱日治時期的教育為「愚民教育」、「奴化教育」，而全盤否定其價值。影響所及，日治五十年的臺灣被簡化為只是一部臺灣人拋頭顱、灑熱血以反抗異族統治之歷史，至於其他歷史面相則刻意加以忽略，不僅歷史教學不予提及，甚至歷史研究亦不被允許，結果，臺灣史研究長期不受重視，而日治時期臺灣史則幾乎不在學者的研究範疇中。


然而，最近二十餘年來，隨著臺灣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風潮之進展，臺灣的歷史學界從事臺灣歷史研究者迅速增加，臺灣史研究風氣日益熾盛，遂至於成為顯學。本人於2001年撰文檢討國內歷史研究所碩、博士論文主題時，指出1975年以前，以台灣史作為碩、博士論文者仍為數甚少，僅8篇，只佔史學碩、博士論文總數212篇的3.8%。其後，台灣史論文漸增，

1976至1985年計有31篇，占此一時期史學碩、博士論文總數的8.5%。其中，關於日治時期之論文數仍然有限，只佔20%，而以清代台灣史為題者則高佔62%。1980年代後期漸呈加速發展之勢，1990年代進而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1995年台灣史碩、博士論文已佔史學碩、博士論文總數的30.8%，其中，關於日治時期的論文又佔32%，高居第一位。最近10年關於台灣史的碩、博士論文繼續加速增加，尤其是以日治時期為題者更呈一枝獨秀之勢。此一熱潮之形成，作為此一時期台灣歷史主要資料典藏機關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原台灣省文獻會)可說居首要之功，蓋若沒有台灣文獻館及時呼應研究風氣之倡起，積極整理、開放台灣總督府檔案，那麼在欠缺資料可資利用的情況下，相信會有不少研究者望而怯步。換句話說，台灣文獻館充分發揮推波助瀾之功。

二、戰後迄今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研究之回顧

以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例觀之，1945-2000年關於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碩士論文共計99篇，其中，經濟史33篇最多，占三分之一；政治史23篇居次，約占四分之一；教育史與思想文化史各17篇，並居第三位，各約佔六分之一。另一方面，若就其研究動向之發展觀之，可以說與整體研究發展的脈動相一致。1970年代後期，本人開始進行日治時期書房、師範教育、精英教育研究時，相關的研究仍不多見。1980年代，始相繼有人投入初等教育、女子教育、高等教育、留學教育、原住民教育等課題之研究。1993年初，本人曾撰文檢討向來的研究概況，指出戰後初期的研究大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和鮮明的民族立場，對殖民教育嚴加批判，甚或全盤加以否定；1970年代以降，研究者逐漸建立以臺灣社會為主體的立場，以較務實、客觀的態度去探討問題。今後有待擴大問題意識，將臺灣殖民教育史擺在近代帝國主義殖民





教育史的框架，以及西化取向的現代教育潮流的脈絡中，進行比較研究。其次，在資料利用上，大多數研究僅利用主要的官方出版品，有待廣泛蒐羅學校出版品、報章雜誌、私人傳記文集及口述紀錄等資料。其三，在研究課題和內容上，仍多偏重政策和制度之探討，以及統計資料之整理和說明，有待擴大研究範圍，進行教育內容、社會教育、區域教育比較研究等。其四，在研究方法上，宜結合相關的人文及社會科學之理論、概念和方法，進行有架構的、系統的、具分析性的、客觀闡釋的研究，以提昇研究之水準。

尤其是近十餘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之研究成果，明顯的，遠較過去可觀，以1990年至2004年底為例，至少計有專書13種、博碩士論文39篇、期刊或論文集論文75篇，佔戰後半個世紀之研究成果總數147篇（種）的86%。就研究題目及其性質觀之，其特色為研究課題多樣化，研究範圍大為擴張，不再僅偏重於政策和制度的探討，關於學科設計、教科書、教學活動、學校生活等教育內容的課題為數最多，成為新的研究重點，而社會教育、區域教育、個別教育設施等亦均開始有人研究，的確是一可喜的現象。就資料利用觀之，普遍能利用總督府檔案、學校檔案、教科書、日記、報章雜誌等基本史料，突破過去研究之限制，深化對歷史的認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這些研究成果的品質、內容特色、主要論斷和創見大致如下：

課程配當、教科書及教學活動、學校生活等教育內容乃是貫徹教育目標最實際且最重要的環節，近年來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因此，關於特定學科教育史之探討為數最多，公學校的國語（日語）、修身、歷史、書法、唱歌、體育、漢文、鄉土教育，以及師範學校的體育、音樂教育、美術、臺語、漢文、視聽教育等均見專文或專書，具體呈現日語教育之沿革及教學法之變遷、修身科的道德教育與社會控制之關係、日語及歷史科與殖民統治政策之關係、鄉土教育之特殊目標和內容、藝能科教育之樣態和發展特色，以及臺語和漢文教育之時代意義。

不可否認的，國語（日語）、修身、歷史、地理等為殖民初等教育培養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主要的學科，教科書提供系統的、普及的、權威的知識以塑造「集體記憶」。蔡錦堂、周婉窈、許佩賢、蔡蕙光、劉書彥等人對教科書的研究不僅仔細探討各科教材編輯演變之過程，深入分析教材內容，並與同一時期日本國內及殖民地朝鮮、滿洲的教科書進行比較。指出國語教科書內容雖具鮮明的意識形態，但近代實學知識和鄉土教材所占比重最多；修身教科書與日本國內及其他殖民地並無殊異，灌輸守規矩、服從、勤勞、衛生的特定道德觀和價值觀，並相當成功地達成其目標；至於歷史教科書則在闡揚「國體」，以涵養日本的國民精神，因此完全以日本歷史為主體，臺灣歷史不過聊備一格；朝鮮、滿洲歷史教科書固然亦強調日本「國體」，但顯然配合歷史背景而有所不同；地理教科書雖以日本為中心，但仍重視臺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的特殊性。綜上可知，關於教科書的研究，均試圖究明教育內容的實態，釐清其與殖民教育政策的關係，研究成果提供不少較客觀、較具體的認識。

教育政策與制度之研究向來即較受重視，關於此一課題，長期以來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惟向來大都只針對臺灣的教育政策與制度進行探討，1998年申美貞對臺灣和韓國殖民教育政策作比較研究，可說開啓全面比較探討之端緒，未來實可以結合臺、韓、日之研究者擴大比較研究的範圍，將有助於適切理解日本的殖民教育。實業教育之研究雖在起步階段，但已顯示其為殖民教育重點之一，畢業生亦為社會精英之主要來源。

區域研究和個別教育設施研究是近年來勃興的新研究方向，同時，各地教育設施亦紛紛展開日治時期校史資料的蒐集整理和校友耆老的訪談工作，透過地區教育設施基本檔案、教育關係者私藏文獻、回憶文字或口述紀錄等資料的彙整，的確可重建較詳實的地方教育風貌，究明個別教育設施發展特色及其社會角色。目前區域教育研究對原始檔案、教育關係者私藏文獻，以





及回憶文字或口述紀錄等基本史料的掌握仍十分不足，以致研究成果參考價值不高。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教育亦是開始受到注意的課題，目前的研究基本史料爬梳不足，過於偏重歷史的解釋，造成論述實證性有待加強，未來後繼者實宜積極開發基本史料，重建原住民教育具體的樣相。至於女子教育方面，游鑑明已作了一些開拓性研究，即使如此，高等女學校、家政學校等中等教育、職業教育仍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至於殖民教育下學生運動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固然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過度強調民族因素將無助於瞭解學生運動真正的原因和意義，有必要擴大問題意識，廣蒐資料，與同一時期日本國內及其他殖民地作比較探討。

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乃是日治時期兩大教化事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中，社會教化團體對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變革的確扮演重要之角色，林麗卿對同風會的研究，指出同風會一面被用於推動同化措施，一面則扮演變革舊習、推動現代化生活之角色。至於同光會、向陽會、共榮會、青年會、處女會、教化聯合會、部落振興會等其他社會教化團體之性質和角色究竟如何，亦均值得研究。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等社會教育機構均是日治時期始出現的新設施，張園東、林孚嘉等人已投入圖書館的研究，開啓社會教育事業研究之端緒。

高等教育設施不僅是社會精英的養成機關，同時，也是學術研究機關。由近年的研究成果可知，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設施係爲了特殊的目的和任務而設，其所培養的畢業生不少成爲南進政策的尖兵，而學術研究成果則是制定及執行南進政策的重要參考。

由上可知，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顯示探討範圍更加擴大、課題多樣化、資料利用更加周延、研究態度更加客觀等現象。



三、新史料的利用與日治時期教育圖像的重建 —以「日治時期台灣學校畢業紀念冊特展」資料為例

這次台灣文獻館經過廣泛徵集和整理散存民間的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料，計獲得多達878件。本著見證歷史、保存史料、提供利用三大目的，進一步分類、編目、篩選，以及製作展示圖錄，自今（2005）年10月起舉辦「日治時期台灣學校畢業紀念冊特展」。這些史料包括幼稚園、公學校、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商業學校、家政女學校、台灣及日本的高等教育設施，以及國語講習所、保姆講習所、產婆講習所、各種技藝養成所等之畢業紀念冊或照片、概況、校友回憶文集、學校週年紀念專輯等，其中，約95%為畢業團體照或畢業紀念冊（即寫真或寫真帖），尤其是公學校畢業紀念冊及團體照為數最多，幾佔三分之二。所謂老照片會說話，從這些為數眾多、拍攝於不同時期的影像資料中，可以具體看到當時各級學校師生制服款式的同異及其演變、髮型的樣式、裝扮的特色及其變化等；而畢業紀念冊中收錄學校沿革、校歌、教職員名錄、畢業生名錄，以及校園的設施與景觀、校舍建築、上課情景、學藝會、運動會、遠足、修學旅行等師生活動之影像，在在均是瞭解當時師生概況、學習活動與學校生活的珍貴資料。至於學校概況、校友回憶文集、週年紀念專輯等資料，則可作為探討學校動態、校風特色、師生關係、教學實際、畢業生動向及其流動等之素材。此外，關於台灣留日學生的紀念冊、就讀學校概況等資料，則可略窺當時日本國內各級學校之建築、設備、校園景觀及學校生活等之梗概，並可作為與台灣各相關學校進行比較研究之材料。

顯然的，這次台灣文獻館主動徵集，獲致令人喜出望外豐碩的成果，尤其是配合展示活動，出版展品圖錄，不但使這些資料成為台灣社會共有的文化資產，更方便研究者進一步利用，這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中已有幾篇利用



這些資料。對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史料的出土，是重建歷史圖像、解開歷史疑點、更新歷史理解的必要條件。文獻館的努力增加了許多珍貴的教育現場的新史料，足以重新建構當時教學活動的實景。

四、結語

綜上可知，固然目前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研究的課題多樣化，研究範圍大為擴張，但關於教育內容之實況仍有待深化探討，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區域教育、個別教育設施、社會教育等方面均仍在起步階段，有必要積極開拓新課題，發掘新史料，進行細緻的小題大作之探討。例如職業教育方面，今後實有待深入探討職業教育政策之變遷、各類職業學校營運實況及其與台灣社會的互動關係。高等教育方面，為適切瞭解近代學術與殖民統治、擴張之關係，今後實有待更細膩地探究各高等學府及各相關學門如何呼應和配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以培育專業人才，以及如何進行專業調查和研究而獲致特殊的成果。區域教育與個別教育設施方面，今後實宜深入且詳實地探討各校發展軌跡和特色，進而重建地區教育之樣貌。社會教育方面，今後有待後繼的研究者探討殖民政策演變與社會教育發展之關係，並針對各個社會教育機構及社會教化團體進行個案研究。唯有當前述各方面之研究完成史實的重建之後，接著，才可望漸次展開整合型課題，一方面利用向來相關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歸納之研究，一方面進行殖民地的比較研究。如此，方可期待較客觀、較適切的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成果之出現，提升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研究的境界。

正因為如此，個人認為從這次台灣文獻館徵集的結果顯示，各地民間仍保存著不少個人接受殖民教育經驗相關的史料，只是戰後長期以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任其閒置或廢棄，這次文獻館能及時主動徵集和整理，令人



感佩。未來若能在此一基礎上繼續有計畫地徵集，並繼續將新徵集的史料整理出版，一則足以搶救散存在民間的教育史料之湮滅，一則能使史料更加豐富。其次，十餘年前宜蘭縣史館曾全面徵集縣內各級學校仍留存的日治時期學校檔案和資料，及時地將珍貴的地方教育史料彙集，並製作微捲，因而開啓區域教育史徵集和研究之先例。未來文獻館若能喚起全國各學校將現存日治時期的檔案、學籍簿、生徒成績考查表、生徒明細表、修了生台帳、家庭通信簿、教科書、教具、學用品、課外讀物、校友會刊物、照片等資料清點整理，製作成數位檔案，提供給檔案機關或文獻館編目典藏，將是台灣教育史研究界的一大福音。

再者，向來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時，爲補文獻資料之不足，研究者往往必須訪談耆老，作成口述紀錄，不但因而突破文獻之限制，並得以較適切地理解史事之真意。近幾年來，台灣教育史研究會成員正配合研究計畫進行耆老之問卷調查和訪談，整理成文字紀錄並徵得當事人同意後，預定進一步出版口述紀錄專書，讓研究界能夠方便參考利用。例如最近本人與許義雄、楊思偉、翁麗芳、蔡錦堂等教授，正打算由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出版《口述紀錄—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公學校經驗》一書。藉此機會呼籲文獻館及全國各地文獻機關、文史工作者、台灣史研究者等大家一起來，把握時機，針對各地耆老進行訪談，並作成紀錄正式出版。相信將因此更豐富日治時期的資料，並有助於我們較具體且適切地掌握和瞭解日治世代台灣人走過的歷史。



圖1

吳文星教授在本館94年度「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之後作專題演講
(2005. 10. 27)



圖2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展場之一 (2005. 10. 14)



圖3 「棟花盛開時の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展場之二 (2005.10.14)



圖4 「棟花盛開時の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展場之三 (2005.1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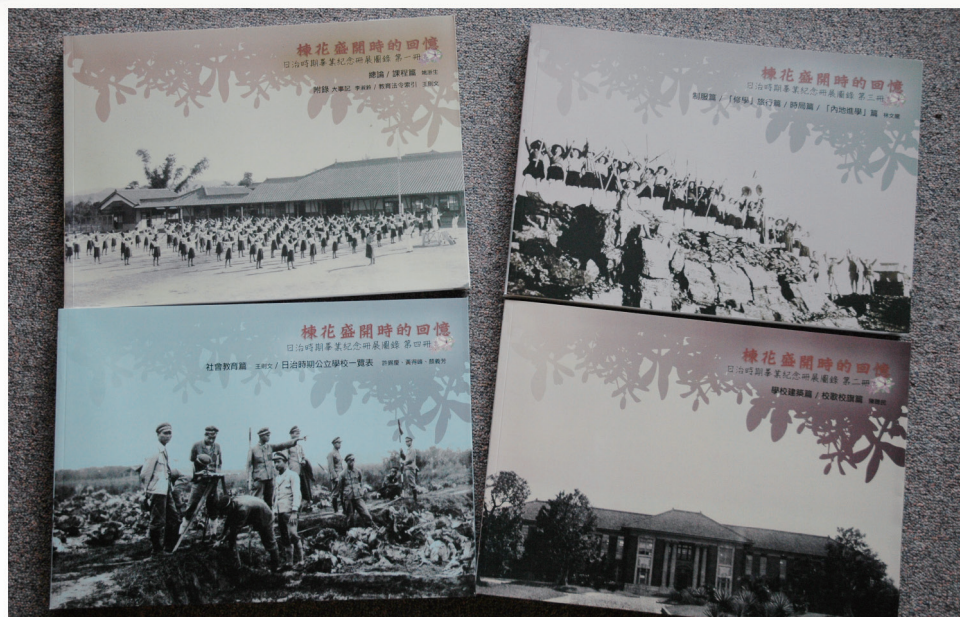


圖5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時期畢業紀念冊展圖錄》（一套4冊）（2005.12）